



抗战文學概觀

苏光文著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抗战文学概观 苏光文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重庆北碚)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125 插页:2 字数:166千
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书号: 10405·2

定价: 1.67元

序

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反映抗日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的斗争和生活的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现代新文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但是，过去长时间对抗战文学似乎缺乏认识，并没有把抗战文学放到中国现代文学中它应有的地位上使它得到应有的评价，而每每是看轻了和低估了抗战文学。抗战文学在学术研究和专业教学中一直显得薄弱。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教师则更有切身之感，说“抗战文学是现代文学中很重要的一段，但我们讲文学史时，往往头重脚轻，讲到抗战就匆匆忙忙要结束了。随抗战文艺资料的挖掘，我想这个偏颇是能得以纠正的。”这番话是有代表性的，道出了问题，的确值得注意。资料的挖掘固然重要，但问题还不仅在于此，更重要的是对抗战文学的认识、看法和估计。好在近几年，由于不断解放思想，打破多年的精神桎梏，清除左的影响，抗战文学也才逐渐受到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开展起来，并还有一些专人在作专门研究。

苏光文同志深感抗战文学是一门很有价值的学问而致力于抗战文学的研究，做了不少工作，搜集资料，探讨问题，撰写论文，孜孜不倦，前后六年有余。现在他已写成了《抗战文学概观》一书，概括地论述了抗战文学的主要问题，开宗明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他先是能充分占有资料，查阅近四百万字，从一百二十余种刊物、二十余家报纸和三十余种丛书摘抄资料一百三十万字左右。这些都是他到各处十余家图书馆亲自动手搞到的第一手资料。从近几年一些海内外抗战文学研究成果和大量新发掘出来的抗战文学资料看来，抗战文学的研究工作必须加强，其中不少问题需要重新评论，不少问题尚待开拓。他钻研了一些专题，写出论文十余篇约十余万字，都曾在报刊上发表，引起一些同行的注意。他下过这样的真功夫，也就是他为写成《抗战文学概观》这本书所作的先行的相当充分的准备。

《抗战文学概观》是一部带有探索性和开垦性的著作。作者把抗战文学放在“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现代新文学发展中去考察和研究。它不重在叙述抗战文学史实和文学现象，而重在探讨抗战文学运动、抗战文学理论思想和抗战文学创作中带倾向性的问题。由于抗战文学被结论为所谓“右倾”，现又被海外中国现代新文学研究者贬为什么“凋零”，甚至是什么“开倒车”。因此对这些关系抗战文学的重要问题就不能不进行论辩，给以正确的科学论断。

本书着重阐明抗战文学的性质与地位，论述文艺思想斗争和文艺理论建设，批判国民党文艺政策，辨正过去文艺史书对《华威先生》引起的“暴露与讽刺”的论争的错误评述，等等。对洞察抗战文学，这些都是必要的，是得先弄清楚。

本书用较多的篇幅，对抗战文学创作做了概貌的勾勒，对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了评述，报告文学、诗歌、戏剧、小说都专章论列，力图显示出抗战文学的思想与艺术发展的脉络。

总的看来，对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想理论探讨较多，而对作品的艺术研究得还不足，因而抗战文学的艺术特征和艺术成就就难

于充分显示。

《抗战文学概观》是一本可读的书，因为饭是自己煮出来的，而非炒别人的现成冷饭，何况抗战文学又好象是一个冷门，不趋炎赴热，而又偏不怕冷，还要给冷门送上一点什么火去。

世上有各种各样的文学史，随感式的有之，议论性的有之，史料型的亦有之。大凡随感式的，多凭个人兴趣，自由放谈，会杀偏锋，偶有惊人妙语，可算是一种文学随感录，偏重主观，信笔写出，几乎顾不到客观的评价。议论性的则俨然一个文学理论里手，好发议论，浮论泛议，摆出凌空的架式，缺少文学史料的具体分析研究，不见文学的血肉。而史料型的却不惜堆积文学史料，实而不化。作为读者，我希望从具体研究作家作品着手，也就是从文学实际出发，结合前人和同代人研究成果和围绕当时文学本身的密切相关的问题，研究文学创作实践活动过程的实质，抓住艺术特征，从艺术中见出时代精神和思想意义。研究抗战时期的文学史实和文学现象，以显出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这个断代文学的本来的独特的面貌，它的有机的生命，它的发展的来龙去脉。在整个研究工作要讲求科学性，要有学术的特色和学术的深度。从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说，材料要丰富翔实，论述要透彻得当，着重探讨作家作品的艺术及其与思想的内在联系，从特殊到一般，既不是粗料，又不是空论，既见个别，又明总体。

有人曾把文学史比做旅游胜地的导游人，也有人说它譬如展览馆的解说员。一部文学史可以起导游的或解说的作用，也就是起一个向导的作用，但绝不只是一个导游人或一个解说员，绝不止于此。(当然，连导游或解说都不如的文学史著作就不用说了!)文学史应该比他们高得多，博学多识，有真知创见，真正可作读者的指导和供读者参考。

抗日战争胜利已整整四十年了。《抗战文学概观》是苏光文同志研究抗战文学的第一个成果，在今年庆祝抗战四十周年的时候正好作为一个向它的献礼。

方敏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 一、什么是抗战文学 (1)
- 二、抗战文学的发生与扩展 (6)
- 三、抗战文学的承传性 (13)
- 四、中国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 (19)

第二章 压迫·斗争·发展

- 一、抗战文学所承受的压迫 (24)
- 二、抗战文学所开展的斗争 (28)
- 三、对有害的文艺思想理论的批判 (35)
- 四、进步文艺界内部的思想理论论争 (40)
- 五、抗战文学创作的发展 (49)

第三章 抗战文学的国际交往

- 一、交往概况 (57)
- 二、抗战文学作品的“出国” (63)
- 三、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作品的译介 (69)
- 四、交往的几个特点 (74)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学

- 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领导抗战文学 (77)
- 二、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学的勃兴 (81)
- 三、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学的扩展 (一) (86)

四、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学的扩展(二).....	(95)
第五章 报告文学竞写潮	
一、报告文学竞写潮的缘由.....	(101)
二、报告文学创作成就.....	(103)
三、丘东平、碧野、曹白的报告文学作品	(117)
第六章 新诗的长足进步	
一、新诗理论的再探讨.....	(123)
二、抗战诗歌创作概貌.....	(128)
三、“七月诗派”的崛起.....	(134)
四、艾青、田间、臧克家、袁水拍的诗	(143)
第七章 戏剧的日趋成熟	
一、抗战戏剧运动概况.....	(153)
二、抗战戏剧创作概貌.....	(161)
三、郭沫若、阳翰笙的历史剧作.....	(169)
四、夏衍、陈白尘的现代剧作.....	(179)
第八章 小说的新收获	
一、小说创作概貌.....	(187)
二、小说创作成就.....	(196)
三、茅盾、巴金的抗战小说创作.....	(204)
四、沙汀、艾芜的抗战小说创作.....	(211)
后记	

第一章 緒論

什么是抗战文学？抗战文学的内容、性质、特点、规律是什么？抗战文学与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尤其是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以及与中国当代文学有何承传性？中国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有何关系？这些问题都是抗战文学的基本理论与创作实践的问题，也是一切研究中国抗战文学的人们首先接触到的问题。本章“緒論”就对这一系列问题作些探讨。

一、什么是抗战文学

抗战文学的本质及其时空观，曾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没有形成公论，也曾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无人再行研究、议论，以致于抗战文学在人们头脑中或者淡漠，或者陌生，或者无知。因此，研究什么是抗战文学，实属必要。

早在抗日战争的初期，从事抗战文学的人们，对于抗战文学的理解便不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四种意见：

或曰，抗日战争的文学，直接描写我国军民的英勇抗敌故事和英勇壮烈斗争场面。这里，抗战文学被理解为抗日战争文学了。

或曰，抗战时期的文学，描写抗战时期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反映接近抗战时期的现实。这里，抗战文学被

理解为战时文学了。

或曰，抗日民主斗争的文学，直接或间接反映和推动抗日民主斗争生活。这里，抗战文学被理解为抗日民主斗争文学了。

或曰，新民主主义的文学，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文学就是抗战文学，新民主主义是抗战文学的具体内容。这里，抗战文学就等于新民主主义文学了。

上述种种抗战文学论，虽然有共同点即反映抗战现实，但仍分明表现出人们对抗战文学特质的不同认识，表现出人们社会观、文学观的差异性，而且都带有程度不同的偏颇性。“战时文学”论和“新民主主义文学”论，未能揭示出抗战文学所反映的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生活内容，更没有严格的时空观念，因而未能发生什么影响；“抗日战争文学”论和“抗日民主斗争文学”论，却发生过广泛影响，一时几乎成为抗战文学的代名词。当时有一种说法是：

应直接描写抗战与民主斗争，“要用铁的笔，蘸着鲜红的血，在大众心头，着力刻画，使每一个人都怒吼，暴跳，这才是抗战的文艺”。

这，不只是存在于认识与主张上，文学创作上亦复如此。芦沟桥事变、淞沪战争、台儿庄战役，一时间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以显示出中国人民对于抗战的决心与勇敢、认识与希望、对于牺牲之忍受与对于最后胜利之确信。事件的文艺性与文艺的事件性，成为一时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这两种“抗战文学论”及其创作实践的实际价值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但是，由此而出现的偏离文学规律的现象——题材过于狭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的产生，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进步文学界

对此进行广泛讨论，便是明证。也正是通过多次而广泛的讨论，人们对于抗战文学本质的认识，才趋于一致。

抗战文学虽然成为一种文学历史陈迹，然而人们于今对其认识尚不一致，甚至迥异。

首先，表现在时间概念上，主要有这么三种认识：一是认为抗战文学的上限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下限为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抗战结束；二是认为抗战文学的上限为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下限为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抗战胜利结束；三是认为抗战文学的上限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下限为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其次，表现在本质及其意义的认识上，主要有这么三种：第一、抗战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一翼；第二，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新文学的“凋零期”，“中国现代文学在抗战时期开了倒车”（我们暂名之曰“凋零”论、“开倒车”论）；第三、抗战文学运动、抗战文学工作、抗战文学创作处于右倾状态（我们暂名之曰“右倾”论）。

凡此种种抗战文学观，便是抗战文学发展过程中及现今海内外人们对于抗战文学的基本认识。我以为，关于抗战文学的时间概念的分歧不是本质的分歧，因为抗战文学不仅是或者说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有着深广的抗战时期的时代内容与时代意义，它受着抗战时期国内外政治的军事的思想文化的种种因素的影响。倒是流行于海外、影响于海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抗战文学“凋零”论“开倒车”论，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因为这两种观点颇含政治的历史的文学的偏见，涂抹上鲜明而浓厚的政治色彩。不过，一时不能取得一致认识，倒也无损于抗战文学的光辉。抗战文学“右倾”论是抗战文学的具体组织者、领导者们从

严要求自己所从事的抗战文学事业而加给的结论，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是不科学的，因为“右倾”或“左倾”是政治概念，在严格的意义上“是党的概念，更确切些说，是党内的概念”，把这些概念用于文学这“无比广大的领域，那就奇怪了”，用在存在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文学势力和复杂的文学流派的“文学发展的现阶段”，“那就是把一切都颠倒起来”（斯大林给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的回信）。同时，这个结论也不符合抗战文学发展过程的实际，因而也是不公平的。造成这一结论的失误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掌握审视国统区抗战文学标准的失度以及三十年代以来左翼文艺批评理论中的“左倾”毛病的影响。（详见拙作《国统区抗战文学右倾论再认识》，《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3期）阳翰笙等同志于一九八三年六月在成都、重庆的文艺座谈会上，已对此结论作公开更正。

那么，抗战文学的时空观及抗战文学的本质意义，应当怎么认识呢？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应当把它放在产生它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并且顾及它与上下左右前后诸事物的联系。毛泽东告诉我们：“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新民主主义论》）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中的重要部分。抗战文学是抗战时期发生发展成熟的特殊历史现象，反映和作用于那一个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因此，只要把它放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里去考察，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中去考察，看看它受着怎样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的影响，看看它在那个特定历史长河中怎样发生发

展成熟的，就不难发现其本质意义与价值，时空界说也就不难弄清楚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把它的侵略魔爪伸进中国，这就直接引起中国社会生活与社会矛盾逐步发生变化。也因此，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出现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与理论主张及部分创作实践。但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仍不是抗日救亡，社会的主要矛盾还不是民族矛盾。两种反革命围剿与两种革命深入，仍日益严酷地进行着，构成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基调。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救亡、抗日民主才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同时，这个时期，决定中国新文学性质、发展方向和内容的文学力量仍处于左翼文学阶段。所以，“九一八”到“七七”事变这段时间的新文学就其本质与整体讲，仍不是抗战文学。但是，这却为抗战文学的出现作了全面准备。也正是有了这个准备，所以新文学“遇到了抗战，便极自然的、合理的，发展为抗战文艺”了（老舍《哀莫大于心死》）。所以，将抗战文学的上限划在“九一八”或“一二九”都是欠妥的。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英勇的八年抗战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势力惨败告终。作为中国抗战史的下限划在此时，无可非议；而作为中国抗战文学史的下限划在此时，就未免一刀切了，因为抗战文学发展过程尚未完结。至于下限划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也是值得商讨的，因为这太远离抗战文学过程的结束期了。（关于抗战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详见拙作《试论抗战文学史的分期》，《抗战文艺研究》1984年第3期。）

我以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抗战文学主要反映而又给予伟大影响的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国抗战时期的社会生

活，体现它的本质与主流的是反映而又作用于抗日救亡、抗日民主斗争生活的文学。它的上限为一九三七年七月，下限为一九四六年五月。

中国抗战文学分为国统区抗战文学、解放区抗战文学、沦陷区抗战文学。它们各以鲜明特点构成中国抗战文坛，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这里，我们所论及的是国统区的抗战文学。

二、抗战文学的发生与扩展

抗战文学随着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胜利而勃兴而扩展而成熟。抗战文学这一概念本身就标志着它与抗战的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它的实际发展过程也是如此。因此，它的发展阶段必然受着抗战发展阶段的影响，但是它是文学，必然受着文学规律的制约。那么，抗战文学究竟是怎样发生、发展、成熟而结束的呢？这就需要对抗战文学发展过程作深入的探讨。探讨抗战文学发展路径，揭示出潜在这一路径中的规律，就自然回答了抗战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但是，清理抗战文学发展路径，揭示出潜在这一路径中的规律，归根到底应以抗战文学发展过程本身为依据。我以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四六年五月，抗战文学在这近九年的岁月中，是分这样四个阶段完成它自身发展过程的。

第一阶段，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底，为抗战文学的勃兴阶段。

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为抗日救亡。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一切不愿作亡国奴

的中国人，以国共联合为主体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这一政治任务和政治情势，在文学领域内得到了深刻、生动、形象的实践与体现。中国新文学、左翼文学自觉地全面地转入抗战文学阶段。中国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文艺工作者，不分政治观、文艺观，不分党派与流派，以无产阶级文学力量和进步文学力量为主体结成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先后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大批文艺工作者到前线、敌后、后方乡村从事抗日救亡宣传鼓动工作，开辟出新的文学据点，逐步形成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战文坛。这就是说，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中国的社会生活的结构形态发生变化，中国新文学原有的文学结构形态亦随之解体，新的抗战文学结构形态逐步形成。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组建、演剧队和抗宣队的创办，这些标志着以无产阶级文学力量为核心的广大的抗战文学队伍的形成。报告文学的大量问世，街头剧、朗诵诗的形成运动，诗歌、戏剧、小说的长足进步，抗日救亡成为这些文学创作压倒一切的主题，这些标志着抗战文学创作占了绝对的优势，一个崭新的抗战文学创作新局面出现了。激励人们的抗日救亡情绪，成为评定文学价值意义的准则，这标志着文学的定义与观感的彻底改变。《抗战文艺》、《文艺阵地》、《七月》、《战地》以及《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群众》杂志等大大小小的报纸刊物相继创刊，这些都标志着抗战文学阵地的确立。这一切，构成抗战文学勃兴阶段的繁荣景象与轰轰烈烈的局面；这一切，表明抗日救亡已经转化为文学的自觉要求，已经转化为文学的实践活动。

当然，不可讳言，这一阶段的抗战文学还存在不足，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艺思想理论论争基本上没有开展，批评贫乏；二是文学创作题材过于狭窄，作品有“差不多”的毛病。产生这些不足的原因在于作家们对于抗日救亡的本质缺乏深刻认识，以为全面抗战爆发了，一切都有希望了，对于抗战的行进和前途盲目乐观。因此，比较地注重统一战线中的团结，而比较地忽视了批评；作家的视野浮泛于生活的表层，因此部分作品出现非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不足的毛病。很明显，这些不足，是抗战文学将抗日救亡转化为自己的血肉过程中出现的。

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九年一月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为抗战文学扩展阶段(上)。

随着武汉、广州的沦陷，国民党政策重心发生转移——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反人民，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相继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强化其法西斯统治。因此，抗日与民主斗争，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雾都重庆便是这一社会生活内容的集结点，也成为这一阶段国统区抗战文学的中心文坛。在这样的社会生活海洋里，广大文艺工作者由兴奋而转入沉思，由热情奔放而转入静默观察。他们的视野向生活的纵深处突进，深入到生活的里层，渐次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本质与人民大众的心声。抗日民主斗争生活成为他们从事文学工作的主旨和创作客体。这就给抗战文学思想理论的探讨与抗战文学创作带来巨大变化，并使之呈现出与上一阶段不同的特点。

首先，集中地大规模地开展了抗战文学思想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论争。这一阶段，进步文学界开展了“民族形式”的讨论，企图解决文艺与人民大众结合的问题；由张天翼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引发的“暴露与讽刺”的论争，解决抗战文艺仍旧需要暴露与讽刺的问题；批判梁实秋的反现实主义的“与抗战无关”论，

强调了“文艺必须抗战，抗战需要文艺”这一文艺与抗战的关系问题；批判陈铨、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国派”，抨击了反动的法西斯主义政治观与文艺观。这些论争，促进了抗战文学沿着抗日民主的政治方向和现实主义道路向前发展。

其次，抗战文学创作转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暴露与讽刺国统区的黑暗，抒写浓雾之中人民大众的悲苦生活。体现这一新阶段的到来的文学作品《华威先生》虽然问世于上一阶段，然而暴露与讽刺成为文学创作主潮却还是本阶段的事，郭沫若的《屈原》、茅盾的《腐蚀》、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巴金的《火》、艾青的《火把》、宋之的的《雾重庆》、沙汀的《淘金记》、陈瘦竹的《春雷》等等，或取材于历史或取材于现实的作品，便是这一文学创作主潮的代表作。这些作品的作者，既是著名作家，又是抗日民主斗争的战士，因此这些作品的发表或演出，表达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要抗日要民主的呼声，起着显著的政治作用。同时，如果说小型多样的文学作品占领了上一阶段抗战文坛的话，那么，长篇巨著便占据了这一阶段抗战文坛的优势。这些，都标志着抗战文学创作有了显著的发展与进步。

再次，广泛开展抗战文学总结活动(当时称之为“检讨”)。“文协”、“文工会”、《抗战文艺》、《文艺生活》、《新蜀报》副刊“蜀道”等文艺组织与文艺报刊的编辑相继召开文艺座谈会，或总结抗战以来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或总结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的抗战文学发展概况、成就与不足，其目的是深化现实主义，推进抗战文学与抗日民主斗争紧密配合。

这一切，都表明抗战文学已进入扩大与发展阶段，进入全面成熟的阶段。